



郑永年看中国

为中国辩护

IN DEFENSE OF
CHINA

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目前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
都已经无助于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而如果不能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
则中国的继续前进以及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将无从谈起。

郑永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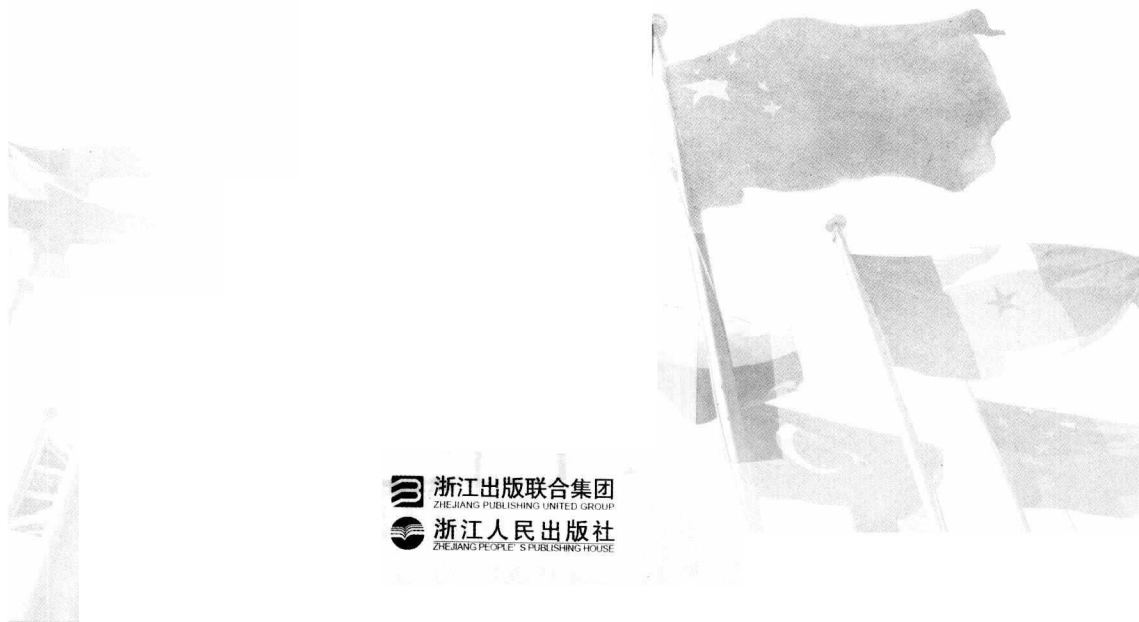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为中国辩护

IN DEFENSE OF
CHINA

郑永年 著
黄彦杰 编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中国辩护 / 郑永年著.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3

(郑永年看中国)

ISBN 978-7-213-04776-3

I. ①为… II. ①郑… III. ①发展战略-研究-中
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4814 号

- 书 名** 为中国辩护
作 者 郑永年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 王利波
责任校对 张志疆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0万
插 页 2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776-3
定 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编者序

“郑永年看中国”系列收录了郑永年教授近十年来撰写的有关中国政治、社会、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评论文章。本书是该系列的第五册，主要收录了作者围绕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部崛起和内部转型这一重大课题撰写的评论。

冷战以来的全球化大潮和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外交转型是当代史的两个重大历史议题。其中，“中国模式”更是当代最具意义和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郑永年教授围绕“中国模式”的几篇客观公允、兼顾历史与现实的讨论，正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几十年、以至于百年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简明而深刻的思考框架。在“全球化与中国转型”这个宏大的题旨下，郑永年教授具体关注了中国在经贸、文化、外交、金融等各个层面遭遇的机遇和挑战，并深入探讨了中国应如何应对全球化这一重大战略问题。对于当今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局面，郑永年教授主张中国应继续对世界开放，通过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但同时也要认清中国具体的发展模式、国情历史和制度局限，这样才能在全球化的形势下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繁荣进步。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只有充分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理性稳妥地应对世界、推进改革，方能立于不败之地。闭门造车、固步自封固不可取，全盘西化(美国化)同样也绝非善途。在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国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改革者必须理性思考和分析，才不至于失去对世界形势和自身发展的掌握。

现在,编者把郑教授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文章汇编成书,以飨广大关心中国国运的读者。依据不同主题,编者把文章分为八个部分,包括中国模式的理论思考、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文化崛起与国际形象、作为经贸大国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秩序、改革开放与内部改革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国际观、中国对十年来世界大局变化的回应。这八个方面基本上反映了郑教授近年来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外部崛起与内部转型的见解。在编辑过程中,编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并注明了每篇文章的发表日期和出处,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文,另一方面也能够忠实反映出作者对当时局势的看法以及认识的深化。

最后,编者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给予的热情帮助,特别是王利波编辑的支持和建议。

黄彦杰

2011年12月于新加坡

目 录

第一部分	中国模式的优与困
	中国模式的机遇和挑战3
	中国模式能够被围堵吗8
	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12
	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17
	中国模式的改进21
	中国模式研究应去政治化25
第二部分	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
	切莫夸大“北京共识”31
	中国的崛起：军事大国还是商贸大国34
	如何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38
	中国人应理性看待中国的崛起41
	国际责任关系着中国崛起44
	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48
第三部分	崛起中的经贸大国
	中国的经济外交与和平崛起57
	能源危机对中国国际战略的教训60
	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63
	中国在欧盟眼中的战略利益定位67
	中国应思考如何保护其海外利益70
	中国如何实现战略“走出去”74

第四部分	文化崛起与国际形象
	为什么要追求“文化崛起”81
	中国要追求怎样的外部文化崛起84
	中国国际形象的根基是什么87
	在压力下重建中国民族主义.....91
	中国的崛起要求民族心理的转型96
	奥运会寻回中华文明的自信100
	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104
	中国的文化现状及其“走出去”困局110
第五部分	中国与全球金融秩序
	亚欧峰会检验中国领导能力119
	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国际经济秩序123
	中国如何在G20定位国家利益128
	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中国能做什么132
	G20和中国国际战略的再思考137
	中国如何应对国际力量再“集团化”142
	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与中国的机遇146
第六部分	中国的国际观
	领袖外交中的大国谦卑155
	中国的新国际战略观158
	要预防中国思维的美国化161
	中国的国际观从何而来165
	中国外交思维美国化的后果169

第七部分	对外开放与国家转型	
	要正确处理内外部改革之间的关系	175
	从外部贸易纠纷到内部贫富分化	178
	中国在危机中重新寻找发展模式	181
	中国不能模糊谷歌事件的焦点	185
	中国未来十年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190
第八部分	全球化：中国如何回应世界变局	
	联合国改革触动中国核心利益	197
	从“中国威胁”到“中国责任”	200
	中国再次面临国际战略选择	203
	中国“走出去”应有新模式	207
	中国要确立外交政策国际话语权	211
	中国和西方进入互不确定的时代	215
	相互依存状态下的中国国际环境	219
	中国要加快国际政治话语的建设	223
	中国的崛起及其外交和战略压力	227
	环保经济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开端？	231

1
为中国辩护

第一部分

《《《 中国模式的优与困

中国模式的机遇和挑战

最近很多迹象表明了外部世界对中国作为大国的期望的快速提升和对中国模式认同感的增加。首先是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复苏。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各国还是寄希望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很多人也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抱有希望，但毕竟这些发展中国家从来就没有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人们对新兴经济体能够做什么并不明确。相反，二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总能在拯救世界经济危机中扮演关键角色。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即使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也只是作为配角。

但这次则全然不同。各种指标表明亚洲的经济正在恢复正常，甚至是复兴。而西方，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危机已经见底，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们仍然看不到其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意义。尤其是美国，人们一直在期望美国能够做领头羊。危机发生之后，全世界各国都用不同的方式来“拯救”美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种考量，因为人们意识到，如果美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也会进一步影响本国的经济。但看来，至少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能够扮演此种角色。

与美国相比较，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这次本身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深受外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承担各种国际责任的同时，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复苏自己的经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台了庞大的拯救经济计划，即通常说的包括四万亿人民币在内的一揽子计划；二是政府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重点放在刺激和促进内需上。

兼有金融与经济杠杆

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因为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中国政府具有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实施其危机拯救计划。结果是显见的，这些举措不仅带动了本身的经济复苏，而且也带动了整个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回暖和复苏。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和中国经济体紧密相关的经济体大都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而中国的这种复苏势头又对西方经济体产生了积极作用。如果说在 1997 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作用仅仅限于亚洲，那么这次中国的作用则超越亚洲而对全球经济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人们发现，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好转就与它们对中国贸易的增长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的经济表现令西方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不过，事情还并非仅仅是中国的经济角色问题，从深层次看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有很多年了，中国政府本身在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没有公开接受或者反对这个概念。中国模式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并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这种模式最终能否成功，还有待检验。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们对中国模式则不这样看。曾经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这些年来一直在修正他的观点。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复和中国的崛起都表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最近，福山注意到，尽管亚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一个更有效率的中国。

开放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表明,其政治制度的发展是开放的。尽管中国还被外界称为权威主义的体制,但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发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会 and 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体制。中国政府现在非常推崇民本主义,努力把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中国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过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种机制使得其官员对人民负责。中国的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无论是处理四川地震还是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相对于其他政治体系,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得到了显现。中国和实行其他一些政治体制的国家这些年的发展表明,民主的政体不见得能够有效服务于公众,而中国的体制也不见得不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构架,而是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感受和认知的这些变化,对中国模式来说的确是个机遇。这里既表现为中国的硬力量,也表现为软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其产生的客观外在影响,这是外界所能亲身感受得到的。同时也是一种软力量,就是人们对中国能够产生的经济影响力的主观认知。(很显然,这里的软力量是外界对中国的自觉的认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响力之上的,这和中国有关方面正在大力推动的软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从很大程度上说,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在应对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变化的产生又是对中国模式的极大的挑战。挑战的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对可持续性的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战指的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对华经济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莫大的外部压力(这需要另文讨论)。内部挑战主要指

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转型困难。

中国模式是个统称概念,因为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简单地把经济增长主要是 GDP 的增长作为最重要的指标。尽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无穷的问题,如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社会正义缺乏和环保压力,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那么中国经济模式就很难持续。因此,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努力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可持续性、环保和社会公平成为新模式的主题词。

转型机会的流失

从发展模式的转型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个很好的机会。从宏观上来说,中国可以对自身的混合经济模式充满信心。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产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内需型消费社会。内需型社会无疑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的标志,即从世界大工厂转型成为世界的消费者。

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庞大刺激计划的产物,是大量投资驱动的。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的坏账?中国政府在 1997 年金融危机之后花了大量的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如果这次大规模的投资再次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那么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在刺激内需方面,政府主要还是通过各种金融和经济的举措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但一个消费社会所需要的更为重要的制度基础还是缺失,就是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是很大。在没有这些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内需很难持续下去,更不用说是较大幅度地提高消费水平了。

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地方正在失去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金融危机导致了很多人落后企业和产业的破产,这本来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但

是,很多地方政府错误理解保 GDP 增长,为了达到一定的指标而不惜拯救和保护很多应该淘汰甚至已经被淘汰了的企业。很多高能源消耗和高环境污染的企业因为金融危机而起死回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金融危机大大拖延了中国的产业升级。金融危机正在严重阻碍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由此看来,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确使人感到骄傲,但中国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看到中国模式正在经历着的巨大的挑战。只有当看到了隐藏在中国发展模式中的诸多问题,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时,这个模式才可能持续,中国也才会真正地崛起。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9年9月1日

中国模式能够被围堵吗

很长时间以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会对这个世界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一直是国际学界和政策界的争论热点。在西方,已经出现过很多波的“中国威胁论”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有关“围堵”中国的论调。可以说,中国是在一片“威胁”和“围堵”声中崛起而成为大国的。客观地说,中国的“大国”地位多半是外界对中国的主观认同。与其他从前和现在的大国相比较,中国离大国还有很大的距离。尽管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大国,但作为大国的负担却已经出现了,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家,在制定他们各自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时,开始把中国因素放在首要位置。这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人们可以说,这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值得骄傲,但同时,这种新局面也正在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

西方早已经有人注意到,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的影响不仅仅是战略和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价值观上的。战略和军事上的外在影响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结果,可以预见,也可以应付。但中国的崛起如果表现为一种价值观,那么其产生的影响是西方所难以接受的。如果中国的发展是因为中国学习西方,接受西方的价值,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为西方所接受和称道。这就是西方经常所说的“正确的发展方向”问题。现在,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中国本身价值所致,于是就被认为是对西方的威胁,也就是西方所说的“错误的发展方向”。

在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惜一切力量围堵和遏制以前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阵营。西方的围堵不仅仅是因为前苏联形成了与

西方对抗的战略集团,更重要的是因为前苏联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被视为对西方的最大威胁。在不同程度上,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担忧和恐惧也类似于冷战期间对前苏联所代表的价值的恐惧。对中国模式的这种恐惧已经表现在近年来西方的中国论述上。尽管中国本身不再强调意识形态,但西方不断地要把中国再意识形态化,使用各种充满意识形态味道的概念如“权威资本主义”和“权威民族主义”来描述和打扮中国。

对中国文化“扩张”的不安

最近英国教授雅克(Martin Jacques)出版了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其主题就是中国文化或者价值威胁。雅克认为,如果过去二百年是欧洲模式统治着世界,那么今后百年该轮到中国了。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文化复兴,她将恢复与邻国的那种古老的朝贡依附关系。朝贡体系必将替代欧洲的“主权国家独立模式”。(实际上,雅克的这种说法也并不是新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西方就有一些人围绕着“朝贡制度”讨论中国的文化威胁了。)且不说雅克的这种猜测是否有根据,其论著的副标题显然就反映出西方人普遍存在的对中国模式的深刻担忧。“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这完全是对国际关系的一种零和游戏理解。零和游戏是西方主权国家间国际关系的主流思维,也主导了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现在,西方把这种思维应用到了中国。

对国际关系的零和游戏思维正加深着西方对中国的深刻疑虑和不安。中国有关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早已在想方设法地让西方来理解中国的崛起。早些时候,中国侧重于“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概念,现在,有关方面又投入财力来从事中国软力量的建设(如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等)。但这些努力似乎不但没有消除西方的疑虑,